

ISSN 1002—6924

GUIZHOU
SHEHUI
KEXUE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贵州社会科学

1995 · 5



编辑出版：贵州社会科学编辑委员会

地址：贵阳市梭石巷95号

电话：5828568

邮政编码：550002

印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贵阳市邮局

国内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39信箱）

刊号：ISSN 1002-6924
CN52-1005/C

国内代号：66—13

国外代号：BM456

国内定价：1.50元

目 录

论新的伟大工程的开创和继续推进.....范永海 (2)

论邓小平在实践中把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胡 正 (6)

关于宏观调控理论基础的几个问题.....曹 新 (12)

搞好宏观调控 努力稳定物价.....王录生 (20)

金融期货市场的风险与控制.....刘绍唐 (25)

当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治分析.....张世良 (29)

市场经济对价值观念的双重效应.....龚振黔 (32)

· 贵州经济论坛 ·

对贵州经济发展问题的几点认识.....陈卫椿 (37)

搞好防灾减灾 促进贵州农业持续发展.....黄兴义 (40)

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

——中国当代美本质核心内容的嬗变.....封孝伦 (44)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主 办

主 编：冯祖贻

肖自立 (执行)

副主编：张 劲

中西艺术的比较.....余怀彦 (50)

否定判断的功用辩护.....张学立 (56)

试谈《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办法》的特色.....温卓文 (57)

人的完全解放——中国新文学的根本性质.....黎山晓 (61)

论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歌艺术.....龙泉明 (68)

自强、开放的探寻与呼吁

——晚清旅外文学初探.....黄万机 (74)

普希金与恰达耶夫.....陈训明 (81)

•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

刘少奇建设抗日武装的思想与实践.....徐嫩棠 (86)

抗战初期的贵州防空.....邓德礼 (92)

抗战时期的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何长凤 (97)

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李双璧 (102)

孙中山与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陶季邑 (108)

社 址

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A Bimonthly

No.5 September 1995

Contents

Party Building: Initiation and Advance of a New Great

Engineering *F'an Yonghai* (2)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acro-economic

Control *Cao Xin* (12)

Strengthening Macro-economic Control to Stabilize

Commodity Prices *Wang Lusheng* (20)

Evolution of the Basic Content of Aesthetic Essence

in Modern China *Feng Xiaolun* (44)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rts

..... *Yu Huaiyan* (50)

Full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 Essence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Li Shanyao* (61)

Poetry of Modernist School of China in 1930s

..... *Long Quanming* (68)

Liu Shaoqi's Thinking and Practice on Building Armed

Forces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Xu Nuntang* (86)

Sun Yat-sen vs. Jawaharla Nehru: Comparison of Their

Socialist Thoughts..... *Tao Jiyi*(108)

论新的伟大工程的开创和继续推进

范永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精心描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宏伟蓝图的同时,开创了关系到这一事业兴衰成败的新的伟大工程——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推进这一新的伟大工程。

一、伟大工程的由来和新的伟大工程的开创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即我们党的建党目标是什么,这是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问题。1965年邓小平在给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介绍我们党的建党经验时说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①然而,要根据党所处的时代环境及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找准切合本国实际的建党目标,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才终于找到切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建党目标。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②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对这一建党目标的原则予以确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目标的主体框架。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在激烈的革命斗争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日益发展壮大。1939年我们党有80万党员,到七大时已有121万党员,到建国初期发展到400万党员。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毛泽东同志豪迈地称之为“伟大工程”。正因为我们建立起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才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思想,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了大胆的理论 and 实践探索,做出了重大贡献。

1.恢复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率领全党批判了“两个凡是”和“左”的错误，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③深刻阐明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深远意义和“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④他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⑤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党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他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⑥

2.确立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十年浩劫，百废待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果断地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⑦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和他对我国国情的一系列论述，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十三大后，国内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国际风云急剧变幻，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⑧

3.确立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1979年7月，邓小平指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⑨他进而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⑩他一再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件事。”^⑪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高风亮节，身体力行，带头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四化”，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同时，始终注重从严治党，反对腐败，严明党纪，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恢复和逐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巩固和发展了党的队伍和组织。

在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指引下，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创了新的伟大工程的光辉历程。

二、继续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整体部署

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三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陆续就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作出了部署，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十四届四中全会又着重就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民主集中制、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干部的培养选拔这三个问题集中进行研究、作出

决定，这样就形成了继续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整体部署。

——继续把思想建设这个基础性工程放在首要位置。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抓思想建设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1993年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并作出了学习这部著作的决定，陆续举办了4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共有175名高级干部参加学习，各级党委一级带一级，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已普遍进行轮训，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基本形成制度，出现了全党认真学习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气象。1994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提出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任务。十四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继续把思想建设放在首要位置，推动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要求用三年时间，在全体党员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的学习活动。之后又增补修订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中央指出要把第一、二、三卷作为一个整体来学习。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一任务，中组部、中宣部于今年初联合发出《关于在党员中开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学习活动的意见》。最近中宣部组织编写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中共中央同意印发这个《纲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这一系列战略措施，对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突出抓组织建设这个关键性工程。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组织建设是关键。十四届四中全会之所以就组织建设问题集中进行研究，作出部署，这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党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的需要。

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目的就在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活跃党内生活，激发全党同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使党成为更加有力的战斗整体。我们党是一个拥有5400万党员的大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开创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党的历史经验、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党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四中全会决定鲜明地把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作为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提到全党的面前，并就怎样维护中央权威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强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把贯彻中央精神与立足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对当地人民负责与对全国人民负责结合起来，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和权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贯彻执行好民主集中制，必须有严格而有效的监督。《决定》专门就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作了规定。加强党内监督，最根本的是健全制度，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同时要保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以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和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目的就在于健全和发展党的每个细胞，紧密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实处，使党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实现具有更加巩固的基础。四中全会强调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紧迫感和重要性，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指导方针，对各类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分别提出了要求，重点是抓好农村和国有企业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决定》明确提出全国要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软弱涣散和处于瘫痪状态的党支部进行整顿。四中全会后，中央又专门召开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具体研究部署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

“五个好”的目标。鉴于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尚不够充分，还需要继续积累经验，《决定》重申了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既定原则和要求，指出了努力方向。

大力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目的就在于提高党的干部队伍素质，并保证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使党拥有充满活力的领导层。放眼当今世界，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人才的竞争和较量，是领导人素质与能力的竞争和较量。国内面临着十分繁重的改革和建设任务，而一些领导班子素质有待提高，到本世纪末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面临一次新老交替。着眼于新世纪，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四中全会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明确提出了两项任务：一是必须全面提高现有的领导干部的素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坚强领导集体；二是必须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能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为了落实好这两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四中全会后，中央又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进行专门研究和部署，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规划。最近又制定和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这是使干部工作逐步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轨道的重要一步，对党的组织建设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坚持不懈地抓好作风建设这个保障性工程。最近几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到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认识。江泽民曾尖锐指出：“经济搞不好会垮台。经济搞上去了，如果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横行，严重脱离群众，也会垮台。”为了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早在1990年，十三届六中全会就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3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强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部署，中央纪委又相继召开二中、三中全会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反腐败斗争正在深入展开，前一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进展情况是好的，基本上取得了预期的阶段性成果。从已经揭露出来的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看，腐败现象是严重的，反腐败斗争任重而道远，不能有任何放松。四中全会强调，要继续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进行下去。要深刻认识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在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纠正不正之风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逐步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今年初召开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进一步强调反腐败斗争要继续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新要求以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以来部署的各项任务，着重在深入上下功夫，狠抓落实，抓出成效。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新的伟大工程的三大柱石。现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整体部署已定，主要任务和大政方针都已明确了，只要全党认真真抓落实，我们党就一定能够“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党建交流杂志社）

〔责任编辑：东方霞凝〕

注：

①《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4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2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2、141、191、278、276、191、192页。

⑪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371、380页。

论邓小平在实践中把世界观 转化为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胡 正

半个多世纪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把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成为伟大历史转变的指导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的核心。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实践中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改正毛泽东晚年以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再度辉煌的新阶段。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危急关头力挽狂澜，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除了他的理论建树外，还特别得益于他的革命实践和他不平凡的政治生涯。

一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象邓小平这样在政治生涯中“三起三落”的伟大人物是罕见的。

“一起一落”是在1931年夏，当时他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因执行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撤职。“二起二落”是在1966年，他被戴上“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直到撤职，1973年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失败才导致他的复出。周恩来因病住院后，他在1975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以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精神和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整顿措施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把国民经济很快搞上去了，但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第三次被打倒。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但“左”倾错误没有得到纠正。1977年2月7日，当时的党中央授意在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很明显，如

果按照“两个凡是”办事，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不能得到纠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得到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不可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不可能出台，根本区别于过去那种“左”的政策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也无法提出与实施。

1977年5月，邓小平在还没有落实政策的情况下就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①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又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领导地位的确立，有深厚的实践基础，他的权威是由实践赋予的，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这种权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利用而成为个人崇拜时，就连毛泽东的错误，也被当作真理来顶礼膜拜了。而“两个凡是”的提出，继续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强化了，要指出这样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人物的错误，唯一的出路是诉诸实践。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文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的反对，说这是“丢刀子”、是“砍旗”等，但得到了邓小平的积极支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参加实践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

实践标准讨论的直接成果，是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唯一的根本标准，树立实践的权威，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无论是对他的丰功伟绩的肯定，还是对他的晚年错误的否定，都不能以哪个人说的为准，而只能由实践去作裁判。在整个拨乱反正过程中，他没有为枝节问题所纠缠，而始终是抓住思想路线这个根本。既肯定了毛泽东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功绩，又否定了毛泽东晚年背离实事求是路线所酿成的重大的历史错误。实践标准讨论的深入人心，把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就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扫除了思想障碍，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

邓小平同志在16年的伟大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在继承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大思路之后，将毛泽东同志的若干零散的、局部的、一时的、较为具体的或者正确的但没有展开的思路和思绪，提到了一个较为完整、更加宏观、论证严密、属高层次的阶段，加上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科学地建构了有着内在逻辑发展的崭新的理论系统。

真理是平凡的，对任何真理的认识都是实践的总结，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发展。邓小平多次指出，要拿实践来说话，用实践说服人，让实践做结论。他对待不同观点，对待人们的担心、疑虑，从来不主张搞争论。改革初期，有人对办特区，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对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一度担心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③“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④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最富有说服力。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大包干、三资企业、证券、股市等许多新事物，他都主张不要主观做结论，不要急于做结论，而是让群众做结论，让实践来做结论。“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⑤

邓小平的真理观既朴实无华,也很具体深刻,他始终把实践标准作为最权威的第一标准贯彻到底。生产力标准的出现,一方面是贯彻实践标准的内在要求和合理的逻辑推论,另一方面也是破除“左”的思潮束缚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既是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和完善,同时又是解决现实生活中对于姓“社”姓“资”的困惑和提供判别是非得失标准的必然要求。这些标准的提出都分别处于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都起到了重大的现实作用,都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成果。

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最根本的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和更广泛的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是对实践标准的丰富、深化。“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创造性运用,它把科学认识和价值评估结合起来,使检验标准更具体,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和运用。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使人们的思想认识更加广阔,把实践标准贯彻到一切领域,实现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与发展真理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

邓小平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把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他能够正确把握学习哲学和应用哲学的辩证关系,在“用”字上下功夫。

邓小平一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反对脱离实际地从书本到书本。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⑥他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但《邓小平文选》三卷中的每篇文章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表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解决时代课题的高超艺术和才能。特别是第二、三卷充分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他读的书并不多,但为什么能够具有常人所没有的马列主义水平?这就是由于他能够做到“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⑦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本身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实践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具体问题,而必须通过人的头脑,进而影响人的活动,最后达到对实践对象的改造,其改造世界的实践特征,是作为方法论表现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年代之所以屡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其哲学上的根本原因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割裂开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1942年延安整风后,党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习和研究,不仅编有《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书,而且注重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从而使毛泽东思想逐步发展成熟。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使毛泽东思想发展到辉煌阶段,正确地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有些人拿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现成结论到处套用,重复了历史上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口头上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实际上做的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使世界观和方法论产生严重的背离,使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出现曲折,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了弯路。

马、恩、列、毛以其毕生的精力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为我们建立了极其丰富的理论宝库,如果我们只重视他们著作中的现成结论,而不重视研究他们得出结论的科学方法,就必

然会出现一种生存活剥的局面，也就难免要用现成的结论去乱套当今时代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事实，以致自觉或不自觉地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邓小平正确把握学习哲学和应用哲学的辩证关系，坚持在“用”字上下功夫，注重研究经典作家得出结论的科学方法，并运用这些方法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社会实践中有机地辩证地统一起来，为实现我国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四

邓小平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把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哲学意义，十分重要的在于他能够正确把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在“实”字上下功夫。

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统一的，又是有区别的。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客观现实在思维中的升华，它侧重于认识世界；方法论则是运用这种世界观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关于认识对思维活动和行为活动的指向作用及其所引起的活动方式、方法的理论，它侧重于改造世界的具体的实际运用。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世界观并不能直接地、现成地就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要转化为方法论，必然要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因此，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世界观才能转化为方法论，才能发挥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才能使二者达到高度的统一。

邓小平在“实”字上下功夫，强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于实践之中，努力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他始终善于抓住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实事求是”这一精髓，历来重视从哲学的高度去解决方法论的问题，注意解决世界观向方法论转化过程中的复杂性的问题以及两者之间呈现出差别甚至背离的问题。他积极领导和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克服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法论，使哲学更加深入地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让哲学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实践中开花结果。

邓小平在“实”字上下功夫，还表现在他一贯讲究务实、实效、落实，一贯提倡“多办实事，多做少说。”^⑩“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1962年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会议上讲话时引用的，7月7日他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代表时也讲了此话，它的本意“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立即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⑪这是30多年前他使用过的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以此说明要从务实出发判断事物的正确与否，也就是要以实践的结果和效益作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根本标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早已判明了这个比喻所展现出的方法论意义是正确的，是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

五

邓小平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把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哲学意义，突出地在于

他能够正确把握总结经验和创新开拓的辩证关系，在“新”字上下功夫。

邓小平长期处于领导岗位，面临着革命和建设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他有高超的领导艺术、科学的工作方法；而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工作实践经验，使他能够在实践中发挥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主观能动性，蕴含着丰富的、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在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集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哲学方法论的高度重视和具体思想。他把世界观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不仅是一个实际运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再创造再发展的过程，突出了一个“新”字，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他在实践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具有较高的综合性，并成为人们容易学习掌握的具体操作的方法论原则。他总结的“抓住机遇”，“走一步、看一步”、“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敢冒”等一整套可操作性的方法，使哲学成为实际工作中处处发挥作用的生动活泼的有力武器。

例如，把“机遇”引入对历史发展问题的研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看，这是当代科学精神的最新体现。《邓小平文选》中，起先大量使用的是“环境”和“条件”概念，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一文中开始把机遇从一般条件中区分出来，出现机遇与条件同时并提，以后逐步展开论述。一切机会，都包含有在一定时间内有利条件的意思，而“机遇”表现为时间上的流动性，易变易逝，存在短暂，更是直接地突出了时间上的意义。我国抓住机遇改革开放，起先搞4个经济特区，后来又作出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并迅速取得显著的成效，都充分体现了抓住机遇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有着方法论的意义。

“走一步，看一步”，既反映了实践作为创造活动的实现方式，又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就全局范围或带普遍性的实践活动说，“走一步，看一步”意味着在解决新问题时，首先要进行试点。经过试点工作，对的就坚持并加以推广，错的坚决停止。而无论普遍性的实践活动还是特殊性的实践活动，实施“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并能及时总结经验。“走”就是干，“看”就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失误，避免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只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把握实践作为创造活动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实践是一个过程，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因而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不搞争论”既明确了指导思想，又具有可操作性。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⑩“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敢闯”、“敢试”、“敢冒”是针对改革开放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而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群众化、具体化，是认识基础上的实践，是一种大跨度、跳跃式的超常形式。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很兴奋，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⑪“不搞争论”作为一种主张、一个论断、一条原则，是基于对实践、对群众尊重的结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在处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已经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世人皆晓的显著成果，因而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邓小平一贯重视实现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转化。他的哲学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他无意

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他在不同时间、场合的谈话、讲话、文章的侧重点不同，但有其内在联系，构成一个体系。在哲学思想的表达方式上，以谈话、讲话（包括报告）为主体，《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共222篇文章，其中谈话、讲话共204篇，占全部文章总数的92%，既不是有系统的大部头哲学著作，也不是哲学专题论文。他的每篇谈话、讲话、短文章都是通过实践活动的分析概括、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都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是活的哲学运动。

邓小平哲学思想形态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其表达形式上具有简洁、短小、明确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内容的“新”上，包容性大，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其辩证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都充分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中。

综上所述，邓小平以其特有的哲学形态及其表达方式，阐明了他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把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哲学意义。我们不但应当学习邓小平的一系列理论和重大决策，而且应当更加重视学习和研究贯穿于这些理论观点和决策之中的哲学思想。

我们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仅仅满足于记住其中的一些结论，而要着重把握得出这些结论的哲学根据，应当联系邓小平的哲学思维，从更深的层次上探讨他之所以能够作出巨大历史贡献在哲学思维上的原因，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

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从而发挥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主观能动作用。学习他正确把握学习哲学和应用哲学的辩证关系，在“用”字上下功夫；正确把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在“实”字上下功夫；正确把握总结经验和开拓创新的辩证关系，在“新”字上下功夫，从而使我们的哲学思维能力得到最好的锻炼和逐步提高。特别是当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这就要求我们掌握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尽可能地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实现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转化，这既是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实现实践中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具体途径。

（作者单位：中共贵阳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东方霞凝〕

注：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43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5、155、382、382、382、382、374、91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

⑭《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页。

关于宏观调控理论基础的几个问题

曹 新

一、宏观经济研究出发点的总量内涵

从宏观经济的整体内容来看,准确界定国民经济总量的内涵,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出发点。

在苏联、东欧发生大变动之前,世界上国民经济核算有两大体系,一种叫东方体系,即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为前苏联、东欧和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另一种叫西方体系,即国民经济帐户体系(简称SNA),为西方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

“MPS”体系主要是通过社会总产值(TPS)和社会净产值(MPS)即国民收入这两个总量指标来衡量国民生产活动的。“SNA”体系则主要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和国民收入(NI)这3个指标来衡量宏观经济活动的。这两种核算体系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一样,核算的范围也不相同,所以得出来的国民收入在量上也是不一样的。

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总产值这两个总量指标在统计范围上是不相同的。社会总产值又称为社会总产品。它是以货币表现的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包括饮食业和物质供销社)五个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产值之和。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总量的货币表现。从核算范围来看,国民生产总值除计算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外,还计算各种服务业、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研究以及金融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从价值构成来看,国民生产总值只计算在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过程中增加的价值即增加值,不计算消耗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中间产品和支付其他部门的劳务费用等所谓中间投入的价值。

通过对两种综合统计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总产值这一总量统计指标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是不合适的。第一,社会总产值这一统计指标的核算范围过于狭窄,它仅仅限于物质生产部门,而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因而不能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增长。第二,由于社会总产值比国民生产总值多了一项“中间消耗”,这一统计指标包含着巨额的重复计算和夸大成分,容易助长“产值挂帅”,忽视提高经济效益,因而不能准确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实际增长。正因为如此,人们更多地采用国民收入指标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指标。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由社会总产值改变为国民生产总值,也就合情合理了。

然而,我们认为,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虽然能够比较全面的衡量经济增长,而把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统计指标作为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中的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同样是不合理的。第一,

由于国民生产总值不计算消耗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中间产品和支付其他部门的劳务费用等所谓中间投入的价值，就不可能全面反映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无法使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和实物上实现按比例补偿。因为只有当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之间和在物质构成上保持一定比例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才能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和实物上得到替换，整个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才能顺畅。第二，国民生产总值不仅认为各项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是创造国民收入的共同源泉，通过三要素形成的个人收入才算做国民收入。这其实与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把政府机关、宗教活动等部门的的活动都作为“间接生产者”而列入生产部门，这同样是不正确的。其实政府行政管理、国防、宗教与团体、社会消费和集体福利事业等并不创造国民收入，它们所需要的费用，都要由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来提供。如果硬要说它们也创造国民收入，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包含有很大部分的重复计算。因此，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基础的总量指标，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

因此，我们认为，为了有利于国际间统一进行经济增长的比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是很必要的。但作为宏观调控理论基础的国民经济总量，只能是社会总产品。作这样的区分不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我们所讲的宏观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最简单的意义来说，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同时就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条件，也是宏观经济顺畅运行的条件。离开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便无法进行，宏观经济的运行必然受阻。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总量平衡问题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此外，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实际都是部门之间相互提供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关系，它们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所以，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平衡，也要以社会总产品及其构造的原理作为理论基础。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阐述，因此，社会总产品应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基础研究的出发点。

那么，把社会总产品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研究出发点的总量指标是否包括劳务呢？也就是说劳务的价值是不是应该作为社会总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呢？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总产品是不包括非生产性的劳务的。我们认为，对此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劳务是什么？我们这里所说的劳务并不是指全部非生产领域。这里所说的劳务实质上是一种服务，一种使用价值，如医疗、导游、咨询等等。马克思指出：“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①对比物质产品的商品来说，劳务即服务似乎是无形的，但实际上各种服务都具有一定的、特殊的实物形式。所以，说劳务是一种非物质财富的实物形态是有道理的。尽管劳务（服务）的生产和再生产同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相比还有差别，但劳务和物质产品在再生产方面又有其共同点，如劳务（服务）和物质产品一样，具有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劳务（服务）都具有商品的性质，要通过等价交换，要用货币去购买，这与物质产品并无区别。又如劳务和物质产品在满足人们的需要上是可以相互补充和相互取代的，这也可以说劳务相当于物质产品。这些都说明，不论是劳务还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正是这些理由，成了劳务成为社会总产品一个组成部分的科学依据。^②这样，作为宏观调控理论基础出发点的国民经济总量内涵的社会总产品就等于物质产品加劳务，更确切地说，社会总产品价值等于物质产品价值加劳务价值。这样界定社会总产品并不违背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而恰